

# 经济学就是社会医学

平新乔

## 美国留学与归国时期(上世纪90年代与1998年至今)

我1989年底赴美,先做两年访问学者,1992年进入康奈尔大学读经济学博士,1998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后回国,先在清华,后又回北大教书。

到美国后,在哈佛和麻省理工遇到世界顶尖的经济学家,发现他们都是自己的同龄人,但是他们的论文用清晰的符号直达问题本质,简洁而深刻。在美国学习的收获主要有四:一是学会了用数学模型做一些宏观或微观上的题目;二是通过学习计量经济学和编程课,会进行全过程数据处理;三是实打实地去数学系、统计学系学习,知道数学就是数学,没有所谓的“经济数学”;四是明白只有读大量的经济学论文,才找得到自己做研究的点。

我在康奈尔大学经济学系的导师R.Masson,是实证产业组织领域的权威,他建议我做实证研究。于是,我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1985-1987年的国有企业调查面板数据,做了关于“预算软约束”的“软”表现在哪里的研究。用数据测度了中国国有企业在上世纪80年代预算约束“软”的程度及其变化。这个研究在理论上是有意义的。

归国后,我的研究达到了初步的数字化,对以前的问题会有新的发现,可以立足祖国,放眼世界,从中国人手把经济研究成果做出来,服务于国家发展,也引起国外学者的关注。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研究国有企业改革。对于研究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在整个经济中应占多大比例的问题,我贡献了理论模型,在《经济研究》发表,引起较好的反响。在研究国有企业实行委托-代理契约为什么老是失效的问题上,我发现国有企业的体制本身是排斥市场契约的,于是做了实证研究,发表在《经济研究》上。

二是研究产业组织问题和国际贸易里的产业组织。这方面有定量的研究结果,发表了几十篇论文。市场机制分价格机制和产业组织两个层次,产业组织是软组织,西方经济里的产业组织积累了几百年的经济和文化发展成果,千万不要让一个错误政策毁掉产业组织。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让我们获得了孙冶方经济学奖。

三是做财政和税收改革的研究。通过有数据的实证研究,分析财政分权下的地方政府财政行为,包括地方债和地方融资平台。先后完成了20多项国家社科、省部级研究课题,又新发表了100多篇论文,其中也有国外发表的,新出版10多本著作和译作,著述达300万字以上。研究是没有止境的,总是会有新的信息出来,会有新的现象发生,所以我的研究会不断更新。

此外,我得报答北大、华东师大等母校对我长期的培育。报答方式之一就是贡献于本科生教学。2015年我被评为北京市教学名师,2001年编写、出版的《微观经济学十八讲》一书至今已重印了32次,还在继续行销,影响着广大青年学子。有生之年,我还会编出新的微观经济学教材和别的教材、作品来,争取活到老、学到老,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总结我的经济学人生,我有几点体会:

1.一个人进步的机会总会有的,关键是自己要争取、要寻找。置身于任何人群里,必有你的老师,关键是要仔细辨认。哪怕是草根,也不要气馁,即便是处于穷乡僻壤,捡到一张旧报纸碎片,也值得仔细阅读,把上面的字“吞”下去。

2.经济学要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以小见大。找不到小切口,会一事无成。

3.做研究、写论文应百分之百认真,一定要做真学问,因那一瞬间的思想结晶往往会成为永恒,好东西才会不朽。

4.世界的本质是数。数字化才有效率,数字化才有利润。医学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因数字化而大大提升了治疗水平,从而使人类寿命大大延长。经济学就是社会医学,对经济中发生的疾病要诊断精准,施药精准,就需要数字化。数字化会大大提升人类的幸福水平。不重视数字化的经济学部门是会被淘汰的。

5.读书要联系实际。重视实践和实际信息,读海量的经济学文献可能不如做一个简单的数据回归。因为现实问题总是超越书本知识的。读文献可能归纳不出思路来,会迷失,而从数据回归的结果中则能够发现新现象,而新的发现才是经济学发展的源头。

我能取得今天的成就,离不开党和组织的培养,而我自己也确实不放过任何一个上进的机会。进步就是“一条链”,一步步地走好了,走踏实了,人生的路才会越走越宽。

## 名家小传



平新乔,1954年出生于浙江绍兴柯桥,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讲席教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兼系主任,北京大学经济学与管理学部副主任,北京大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2015年获得北京教学名师称号,2007年获孙冶方经济学奖。1998年从美国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在国企改革和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国财政与税收改革、产业结构转型和产业组织等领域,已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200余篇论文,完成国家、省部级研究课题20多项,出版专著和译作20多部,关于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研究在理论界和决策部门都具有重要影响力。



扫一扫  
看视频

## 思想人生⑦

我在经济学上起步很早,但先天不足。从1970年上华东师大开始,至今已逾半个世纪,我的经济学人生大体分为上海时期(上世纪70年代)、北京时期(上世纪80年代)、美国时期(上世纪90年代),及从美国归国服务时期(1998年至今)。我的学习、从教与研究是交叉着的,学了教,教了又学,边教边学边研究。成长的每一步都有师长的指导和提携,每一步都经过艰难的奋斗;在研究中逐步学会直面现实问题,迎接时代挑战。

## 上海时期(1970年-1983年)

1966年我从浙江绍兴柯桥双读小学毕业。学校虽然是以前乡里的土地庙,但有好老师,语文老师是教我们写毛笔字、临柳公权帖子的李依仁和绍兴师专毕业、教我们文学和修辞的田三生。正是老师教给我的毛笔字功底和作文基础,让我在编村上墙报时出了一点名,1970年被推荐上了华东师大,也正是这两点基本功,我被学校找去编大批判专栏,有了进一步学习的机会。

来到上海这个中国文化重镇,我在受益太多。列举几位教授:冯契,中国当代最杰出的哲学家之一;陈彪如,当时他还未“解放”,却私下给我开书单;徐怀启,清华大学送到美国哈佛大学留学后归国,1977年夏我被华东师大一些老师批判时,有一天他把我叫到政治教育系教学楼前的冬青树丛旁,郑重其事地对我说:“你是一个非常纯洁的人。”这句话,温暖了我整整一生;陈旭麓,华东师大历史学大教授,在自家客厅非常亲切地指导我如何研究章太炎。

促使我以经济学为主业的转折是,1972年12月至1973年5月,我被选到上海市委写作组经济组办的《资本论》读书班学习。授课教员是复旦大学经济学系全套班底。班里就《资本论》单课独进,日日夜夜围绕《资本论》学习切磋,让我对于《资本论》有了系统的掌握。1972年12月,周恩来总理作了关于粮食问题的批示,市委写作组要安排人写文章宣传落实,这个任务交给了我。经桂世勋老师精心指导下,《工业劳动力增长要与农业发展相适合》一文发表在1973年7月19日的《文汇报》理论版上。这是我做经济学研究的开端。可能是因为我发了这篇文章,毕业后我被留校教政治经济学。

1978年我被调到上海体育学院。这里离复旦大学很近,于是,我开始旁听复旦大学经济学系的课程一直到1983年。1980年6月还听了吴敬琏先生回母校所作的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3次讲座。新的时代已经开始,催生新时期的经济学主要阵地在北京。1977年我就读于光远先生关于资产阶级权利和唯物史观的论文和讲话记录稿,认定这才是彻底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我决心到北京求学。

## 北大时期(1983年-1989年)

1983年我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读研究生,师从中国经济学泰斗陈岱孙教授。在陈岱孙、厉以宁、胡代光、范家骧等老师的培养下,我补了许多课,配备了

做经济学必须的数学工具。最关键的是,这些一流经济学家对我的教诲,使我改变了以前只会从马列书本里找题目做论文的办法,而是直面经济现实,从经济现象里提炼问题,给出分析。从毕业留校到被派往美国留学的4年里,我在《经济研究》等国内顶尖刊物上发表经济学论文30余篇,出版了两部著作、两本译作,共有160多万字的著述。

北大研究生学习是我经济学人生一个重要转折点。厉以宁老师给我们上《剑桥欧洲经济史》和《国际金融学说史》(与陈岱孙先生合上)。他规定我读《剑桥欧洲经济史》第四卷、维纳(viner)的《国际贸易理论研究》和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等5部英文原著。我都读下来了,还做了读书笔记。我在课堂里讲了维纳的《国际贸易理论研究》后,厉以宁与陈岱孙拍板把我留下来做北大教员。

陈岱孙老师鼓励我加强数学学习并直接指导我做硕士论文。论文题目是《十九世纪初英国的金块争论》,他让我通读了十卷本的《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还读了桑顿、博赞特克、图克等人写的十几本英文著作。论文初稿有六万余字。陈岱孙老师亲自修改,对第一稿他写出8000来字的批语;对第二稿,先生说“好多了”,可是仍然给了我2000字的批语。这样做论文,让我获得了在经济思想史领域与国外学者一起交流的自信。

留校后,我在厉以宁当系主任的经济管理系当主任科研助理,协助厉老师开展国家重要经济改革课题研究,开始把自己在北大所教的课程与中国正在发生的伟大的经济体制改革结合起来。教的三门主课是《经济发展国际比较》《财政学》和《微观经济学》。企业改革是我在1986-1989年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当时我们遇到的真问题是,经济改革是以价格改革为中心,还是以企业改革为中心?我们在调查中发现,事实上企业只要有一部分价格控制权,放开一部分产品的价格,资源配置的效率就会改善,即门只要开一条缝,剩下的空间就好办,这就是“边际调节”意义上的改革,这让我对于“边际定价”有了新的认识:其实我们不必追求一般均衡,不必追求价格完全放开,只要在边际上放开,后来的事情就会顺理成章。这也让我对于西方经济学按照一般均衡来主张“休克疗法”的做法有了不同的看法。

就这样,在厉以宁老师的指引下,我开始形成自己的研究重点,就是以国企改革为中心,涉及企业金融和企业税收。同时,我也向在北京的校外老师学习,与一些智库合作开展研究,认识了许多青年经济学家,也结识了吴敬琏这样的大学经济学家。我曾直接跑到吴敬琏老师的办公室里向他请教,还到他家接他到北大讲课两次。

因此,这个时期,影响我的经济学研究主要是三个力量:第一,在北大校内主要是陈岱孙、厉以宁等老师,帮助我逐步形成经济研究的问题意识,开始让我直面中国经济的真问题。第二,在校外,能与诸多研究机构同行交流学习中我能感知到最新的经济问题,形成自己的经济学理论观点。第三,国外经济学家对我的影响日益增大,我开始找国外经济学刊物上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成果,认识到中国经济学研究需要国际交流。

# 实现整治村庄向经营村庄转变

沈月琴 吴伟光 陈嫩华

貌整治文章。对于从村庄建设向村庄经营转变过程中面临的制度性、机制性、政策性等问题,或缺乏改革创新思路,或害怕犯错担责,导致关于“村庄经营”的改革无法真正落地见效。

重旅游开发,轻农业农村特色生态产业培育。把村庄经营简单地等同为乡村旅游,是目前村庄经营推进中存在的较普遍倾向之一。村庄经营的内涵不仅远比乡村旅游丰富,而且并非所有乡村都适合旅游开发。在具体实践中,不少地方往往忽视当地区位条件、资源特色、产业基础,在缺乏充分科学论证与市场调研的情况下,凭主观意志将旅游作为村庄经营的主要方向,最终导致“轰轰烈烈”开场、“冷冷清清”收场的尴尬局面。

重政府力量,轻市场机制。多年来乡村建设主要由政府主导实施,依靠财政投入来解决基础设施等“硬件”问题。客观地看,这种“政府包办式”的乡村建设,有利于加快建设进度、提升建设效率、凝聚农村人心。但是,在从乡村建设向村庄经营转变过程中,如果仍然采用固有的“政府包办”模式,不能吸引当地百姓和市场的积极参与,无法形成符合市场内在规律的经营机制,村庄经营将无法持续。

## 从建设转向经营的着力点

加强村庄经营的顶层谋划与专业指导服务。村庄经营是一项新生事物,需

要政府的顶层谋划和专业指导服务。要尽快明确村庄经营的管理职责归属部门,制定相关建设运营标准,为村庄经营有序发展提供规范的指导意见,并配套形成激励与惩罚机制。政府部门一要会同高校或智库专家、村庄经营主体,定期召开村庄经营专题研究与研讨,及时发现村庄经营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妥善处理好村庄建设与村庄经营之间的有机衔接。运营专家和建设专家可以共同参与相关乡村发展规划的制定,基于村庄经营的理念与视角,引领乡村基础配套设施和公共服务优化,建立以村庄经营为导向的投融资机制,提高乡村建设的前瞻性和精准性,确保村庄建设与后期市场化村庄经营相适应。

完善乡村经营与服务主体的培育与选拔机制。一是要改变现有农业技术推广培训方式与内容,依托高校与乡村振兴智库开展村庄经营人才培养,加快培养一批本地化的设计、经营和管理人才队伍。二是要加大“两进两回”政策实施力度,吸引包括乡贤、农创客等群体深入乡村创业,指导村庄经营。三是创新乡村经营主体招选机制,以驻村试运营、模拟运营等方式,提高乡村经营团队招选的科学性和精准性,建立起乡村经营“优胜劣汰”机制。

建立以“混合所有”为基础的利益共享机制,激发参与各方内生动力。村庄经营要形成村民、村集体、运营商、运营商和政府的“利益共同体”,激发参与各

方的内生动力。可建立以农民、村集体、运营商和运营商为一体的“混合所有制”公司,让村民获得相应的生产、服务收益,让村集体获得相应的资源资产所有收益,让运营商获得资产收益,让运营商获得运营收益,让政府获得经济和社会收益,让社会获得生态和公共收益。

系统推进农村综合改革,为村庄经营提供制度保障。推进村庄经营需要从产权、要素和人才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系统性的改革与创新。一是要扎实做好农村承包地等各类要素的确权与股份量化工作,明晰农村资产资源产权关系。二是要建立开放、高效和有序的农村产权交易体系,促进农村资源要素流转与整合。三是要针对村庄经营推进过程中所面临的政策机制障碍,加强部门协作,大胆先行先试,共同解决村庄经营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充分发挥村级党组织的引领示范作用。村庄经营好的典型都证明,一名优秀的村书记、一个坚强的村党组织是经营村庄与治理村庄的关键。要坚持党建引领乡村振兴与乡村经营方向不动摇,充分发挥村级党组织的核心和引领作用。要从激发党组织和村干部的创业创新积极性出发,出台鼓励性措施,让村干部对村庄经营有奔头、有盼头、有甜头。

【作者分别为浙江农林大学副校长,浙江省乡村振兴研究院首席专家,杭州临安区委办公室一级调研员】

## 之江青年论坛

作为高校思政理论课教学的重要内容,“四史”教育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大立宪课考察时指出,思政课的实质是讲道理,要注重方式方法,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这一重要论述既是对思政教育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的根本要求,也是提高高校“四史”教育时、度、效的重要遵循。善用“大思政课”,创新高校“四史”教育方法,探索推进课程化、分众化、生活化和数智化的融合模式,有利于增强思政教育的政治性、思想性、理论性和实践性,更好地实现以史育人、以史铸魂的功能。

“四史”教育课程化:实现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同向而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立德树人是高校的“必修课”,高校应将其融入课程、进入课堂,开设好“四史”教育选择性必修课,纳入思政理论课教学和专业课、通识课的课程思政之中,将“四史”教育融入教学的各个环节,做到同向发力、同频共振。思政理论课要通过合理的专题设计、史料嫁接、场景图片展示等方式,有效挖掘“四史”教育思政元素,加强课程思政建设,使各门课程从不同的角度解读好党的百年历史和丰功伟业,讲透“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实践和我们党永葆生机活力的“青春密码”。同时,重视发挥各类讲座、讲坛等“第二课堂”功能,邀请中共党史专家、革命后代和改革先锋人物等讲好红色故事,讲活“中国之理”“中国之路”“中国之治”和“中国之智”,教育引导大学生自觉担负起民族复兴的时代责任。

“四史”教育分众化:普遍要求和分类施教有机结合。针对高校师生及青年大学生群体的不同特点和思想实际,坚持分众化方式,答疑解惑、回应关切,既强调普遍性、又体现差异性,做到精准有效覆盖,让“四史”教育入耳入脑入心。高校领导班子及广大党员骨干要带头领学,把“四史”纳入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内容,作为党支部“三会一课”、主题党日教育内容,通过专家辅导、专题研学、必读书目自学等方式,提高学习的系统性和引领性,增强守初心担使命的思想和行动自觉。高校思政理论课教师、社科理论工作者要深入研学,加强教学研究和专题宣讲,总结把握“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的教学规律,引导学生知史爱党、知史爱国,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广大教师要不折不扣地落实政治理论学习内容,把学习“四史”提高专业素养作为自身建设的重要内容,不断增强政治领悟力、政治判断力、政治执行力。广大青年学生尤其是学生党员、入党积极分子以及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学员,是高校“四史”教育的重点对象,要把“四史”教育贯穿立德树人全过程,把课堂教学、文化建设和课外实践有机结合起来,通过组织师生宣讲团同台讲“四史”,经常开展追寻红色记忆、寻访先进人物、党史知识竞答、红色故事讲述等活动,厚植青年学子的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四史”教育生活化:课堂讲授与实践体验双向融合。“四史”教育生活化能帮助师生以历史的眼光、场景的感知、实践的体验去理解历史,包括分析历史规律和了解历史人物。要与现实生活紧密联系起来,从“四史”教育情境生活化、内容生活化、语言生活化、教育资源生活化等方面深化探索,以多样化举措推进“四史”教育更接地气,更好地引导大学生知行合一,提升使命意识,内化为自觉行动。比如,以寻根、守根和固根为路径,以“互根铸魂”为主线,组织青年大学生用乡土史料,瞻仰本地的红色革命遗址和革命历史纪念馆等场所,寻访革命历史人物与故事,整理口述史,在历史知识和现实生活间架起桥梁,在生活情境中追溯历史、重温历史,领略革命精神、红色文化的真谛。比如,充分利用重大节庆日和重要纪念活动,把握教育时机,通过祭扫烈士陵园、参观革命纪念馆、向党旗国旗宣誓等方式,组织大学生追忆党的光荣历程,增强前进的勇气信念。再比如,结合暑期大学生“三下乡”等社会实践活动,组织开展助企纾困、乡村振兴、社区治理、生态环保、应急救援等志愿服务活动,常态化推动“学史力行”往实里走、往心里走。

“四史”教育数智化:传统教学与信息技术互促共进。信息化教育时代的大学生思想活跃、个性鲜明,接受新事物更快,习惯从网络平台接受知识与信息,这对如何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进行“四史”教育提出了新要求。对此,我们应以变应变,做到线下与线上融合共进,实现“面对面”与“键对键”紧密结合。要丰富“四史”网络教学资源,创作微视频、网上微课等一批形式新颖的理论宣讲网络资源,通过微信公众号、网上云平台、网络直播课堂等方式,使面向大学生的宣传教育更有创意、更加鲜活。要运用融合虚拟仿真技术、全息影像技术等,建设现代融媒体红色教育体验馆,通过360度沉浸式体验,回望革命来时路,提高学生“四史”教育沉浸体验的阈值。要开发各类手机APP和小程序等通俗型“四史”教育小软件,比如通过“重走长征路”等小程序实现历史场景再现,让“四史”学习教育更加生动、更为有效。

【作者分别为湖州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执行院长】

## 观点万花筒

# 政策需要从供给侧向需求侧转移

近日,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宏观经济月度数据分析会上指出,7月份消费、投资、价格水平这三方面都体现出一个明显回落的过程。在需求疲软和供给冲击双重作用下,需求疲软显得更加为主导,也更为明显。价格疲软反映出中国经济一定要高度重视需求侧的问题,当然供给端也要进一步关注。因此从大的面上,有效需求特别是内需不足的问题,目前正在进一步凸显。

刘元春认为,导致内需不足主要有五个核心因素,第一依然是疫情,在目前政策条件下,只要疫情多点散发,整个社会经济很难进入到一个常态水平,第二就是高温进入。今年7月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偏高,导致全国很多区域电力供应从高峰时期的电力短缺转变为全天电力双缺,这导致很多区域对高耗能产业采取了拉闸限电的措施,因此工业增加值出现了回落。第三是房地产深度调整,房地产预期的回落导致了消费疲软。

而消费疲软主要表现在:餐饮消费仍然没有转正;各种外出的服务类消费、旅游消费大不如前;家具、装修等与房地产基建建筑相关联的消费负增长。第四是地方财政的困难程度超预期来得猛、来得早。第五是民间投资在今年7月份不仅没有持续回升,反而出现了“躺平”的情况。从目前看,民间投资资本收益存在着大量的不确定性,民间投资、民间资本的观望情绪很强烈。

刘元春进一步分析到,这五大方面叠加在一起,就会形成我们所讲的预期进一步减弱的状况。他指出,对于疫情、高温、房地产、地方财政、民间资本这几大因素要有一个深度系统的认识,同时,还要出台相应的政策。这些政策很重要的一个就是需要将重点从供给侧向需求侧进行转移,从地方政府向中央政府进行转移,从常态化的复苏向对重点风险行业进行精准帮扶的转变。同时,也需要在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平衡间有一些新思路。